



THE DR. SEAKER CHAN CENTER F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

转型世界中的政党、国家与治理 ——2014年比较政治发展报告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录

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	复旦大学	李 辉	(1)
民主转型的前景：停滞还是进展？ ——2013 年全球民主与民主转型趋势评估 ·····	复旦大学	包刚升	(19)
政党世界的新变化·····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周建勇	(56)
议会政治的危机及其出路·····	复旦大学	臧志军	(91)
欧债问题的政治根源·····	复旦大学	吴澄秋	(105)
多极化世界的风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	南京理工大学	尤宏兵	(121)
失败者政治——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研究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 春	(144)
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去特殊化的战略 伙伴·····	复旦大学	张 骥	(179)

事件史
对于再
上,他
民的不
来说是
双政体

界中威
力和态
至关重
的、跨
会媒体
会媒体

混合政
,即专
威政权
向责
新的案
和能力
一个侧

民主转型的前景：停滞还是进展？

——2013 年全球民主与民主转型趋势评估

复旦大学 包刚升

如果以塞缪尔·亨廷顿认定的 1974 年作为第三波民主化启动的年份,那么到 2014 年第三波民主化已经行进了 40 年时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 1974 年在南欧启动,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涌入拉丁美洲,80 年代后期波及亚洲的许多国家,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改变了原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面貌,并且在 90 年代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样,到 20 世纪末,只有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显著影响。但是,就在学界感叹中东北非地区的特殊性时,以 2010 年底突尼斯一个小贩的意外死亡为导火索,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的政治运动席卷了该地区,导致多国威权政体的垮台与政治转型的启动。

按照自由之家的统计,从 1972—2012 年的 40 年间,“自由政体”从 44 个增至 90 个,“部分自由政体”从 38 个增至 58 个,“不自由政体”从 69 个减至 47 个,见表 1。另外,在自由之家统计的 195 个国家与政治体中,达到选举民主要求的国家与政治体已经有

118 个, 比例为 61%。^①

表 1 自由之家: 自由、部分自由、不自由政体的数量与比例

年份	自由政体		部分自由政体		不自由政体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2012	90	46	58	30	47	24
2002	89	46	55	29	48	25
1992	75	40	73	39	38	21
1982	54	33	47	28	64	39
1972	44	29	38	25	69	46

资料来源: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3: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尽管过去 40 年的总体趋势是民主国家数量与比例的大幅度上升, 但最近数年里这一势头已出现回落。从 2005—2012 年, 符合选举民主条件的国家与政治体从 192 个中的 123 个(比例为 64%) 降至 195 个中的 118 个(比例为 61%), 见表 2。乔根·莫勒(Jorgen Moller)和斯文-埃里克·斯凯宁(Svend-Erik Skaaning)把所有国家分成 6 种政体类型, 包括: 自由主义民主政体(liberal democracy)、多头政体(polyarchy)、选举民主政体(electoral democracy)以及最低限度民主政体(minimalist democracy)等 4 种民主政体类型; 多党制威权政体(multiparty autocracy)和封闭性威权政体(closed autocracy)等 2 种非民主政体类型, 并制作了示意图, 见本书第 22 页图 1。从该图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担心的两个问题。第一, 第三波民主转型的趋势是否会发生逆转? 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伴随的是两拨民主化回潮, 那么第三波民

^①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3: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主化是否会出现回潮呢？目前尚不得而知，尽管中东北非地区开始启动民主转型，但最近数年里全球民主政体的数量和比例已出现某种停滞的态势。第二，民主与威权政体之间的灰色区域是否会继续扩大？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现在有大量国家属于融合了民主因素与威权因素的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s)。^①

表 2 选举民主政体的数量与比例：2003—2012 年

年 份	总数量(个)	选举民主政体数量(个)	选举民主政体比例(%)
2012	195	118	61
2011	195	117	60
2010	194	115	59
2009	194	116	60
2008	193	119	62
2007	193	121	63
2006	193	123	64
2005	192	123	64
2004	192	119	62
2003	192	117	61
2002	192	121	63

资料来源：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3: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评价 2013 年全球民主与民主转型的趋势？本章将按照不同地区来介绍全球民主与民主转型的最新情况。第一节主要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与财政状况，第二节解

^① Jorgen Moller and Svend-Erik Skaaning, “The Third Wave: Inside the Numb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 2013, pp. 97-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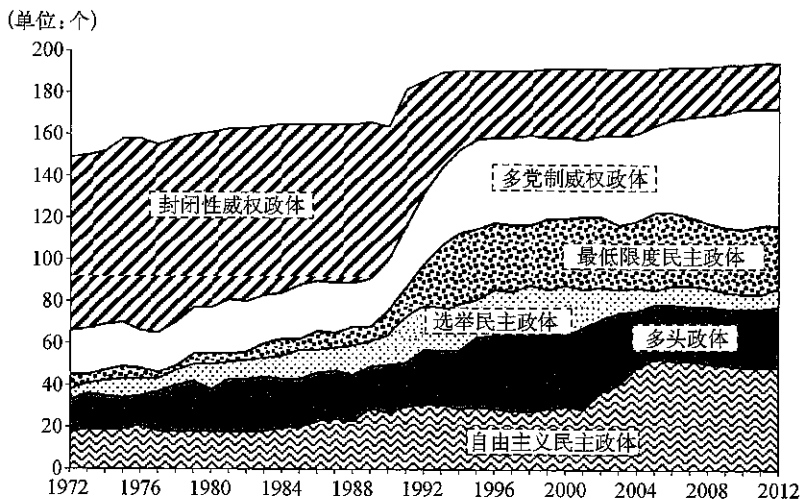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政体类型的全球分布：1972—2012年

资料来源：Jorgen Moller and Svend-Erik Skaaning, “The Third Wave: Inside the Numb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 2013, pp. 97 - 109.

读“阿拉伯之春”的困境,第三节探讨亚洲民主的新迹象,第四节评价世界其他地区的转型与变革。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与财政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除东欧以外的欧洲发达国家、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对这些国家来说,2013年政治上较为平稳——正如其他大多数年份一样。凡是经济较为发达以及民主存续时间较长的国家,其民主政体通常是较为稳定的。这一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符合这两个条件。

对该地区的民主政体来说,2013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延续至今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与主权债务危机日趋严重,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治理

欠佳的象征。2012年,OECD国家公债占GDP的平均比重已经达到108.7%,见表3。

表3 西方主要国家公债占GDP比重的增长(1970—2012年)

年份 国家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7	2012
澳大利亚	21.5	41.3	24.7	16.1	14.3	29.3
奥地利	18.5	22.9	35.8	48.8	57.3	69.8	71.1	70.9	63.1	83.1
比利时	61.9	56.4	74.5	115.3	125.8	135.4	113.7	95.9	88	103.2
加拿大	54.3	45.2	45.6	66.9	75.2	101.6	82.1	71.6	66.5	85.8
法国	40.4	30.9	29.7	37.1	38.6	62.7	65.6	75.7	70	105.1
德国	17.5	22.6	30.2	39.5	40.4	55.7	60.4	71.2	65.3	87.6
希腊	101.1	114.9	114.0	104.6	181.3
爱尔兰	40.1	33.2	28.9	123.2
意大利	55.2	82.4	86.8	88.9	97.6	122.5	121.6	119.9	112.7	127.0
日本	11.2	20.1	47.1	69.4	63.9	86.2	135.4	175.3	167.1	214.3
荷兰	65.3	52.8	58.9	87.8	87.5	89.6	63.9	61.1	52	82.5
新西兰	50.7	37	27	25.8	51.3
挪威	41.7	39.6	39.7	32.6	29.4	40.9	34.2	49.1	58.6	44.7
西班牙	27.3	49.5	47.7	69.3	66.5	50.7	42.3	93.8
瑞典	29	28	46.9	70.4	46.3	81.1	64.3	59.9	47.4	48.6
瑞士	38.9	42.3	43.9	39.1	31.1	47.7	52.4	56.4	46.5	39.5
英国	69.5	53.8	48.7	49.2	32.3	51.6	45.1	46.4	47.2	105.3
美国	46.4	44.6	41.9	55.4	63.1	70.7	54.5	61.4	62	109.6
OECD 平均	40.4	40.3	44.1	57.3	58.0	72.5	70.2	77.9	74.2	108.7

资料来源:OECD网站,单位为%,省略处为数据不完整,网址是:<http://www.oecd.org/statistics/>。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OECD国家公债占GDP比重剧增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国家政府收支占GDP比重出现了持续大幅的增长,二是这些国家选择性地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

但是,财政政策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公债问题,与这些国家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竞争与选举博弈有关。同样,由于这种机制,很多 OECD 国家试图削减赤字与公债的政治努力往往难以奏效。^① 然而,对这些国家来说,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会削弱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

在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希腊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公债危机已经直接影响希腊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希腊通常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样板。自 1974 年启动民主转型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希腊建立了一整套具有充分包容性的、自由多元的政治制度,塑造了稳定的两党制,并先后于 1981 年和 2002 年加入欧共体(欧盟)与欧元区。因此,那时的希腊被视为一个完美的民主而繁荣的欧洲国家。截至 2008 年,希腊是全球 30 个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评价中排名全球第 22 位——尽管低于英国却高于法国、葡萄牙与意大利。然而,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希腊却成了最严重的受害者。经济上,希腊已连年陷入负增长,2012 年公债占 GDP 的比例已超过 180%,最新公布的 2013 年失业率高达 27.5%。政治上,2012 年两次国会选举标志着希腊两党制的解体,国会中政党数目高达 7 个,政党体制的碎片化程度大幅提高。考虑到债台高筑以及政府无所作为,希腊目前已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已经被戴上“欧洲病人”的帽子。

塔基斯·帕帕斯(Takis S. Pappas)在最新发表的“希腊为何失败”(“Why Greece Failed”)一文中认为,理解希腊的困境必须既要解释导致国家失败的原因,又要解释对希腊国家改革进行有力抵制的因素。文化与制度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希腊的困境,“希腊的失败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民粹

^① 包刚升:“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比较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第 108—112 页。

主义(populism)在社会上压倒了自由主义而具有主导型”。实际上,从1981年开始,希腊政治就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m democracy)特征。这种民粹主义民主包含两种机制:国家致力于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政治租金(political rents);以及政党体制确保政治租金以一种有序的和民主的方式得以分配——即轮替方式而非一次性瓜分方式。在1974、1977年两次大选中,希腊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都获得了国会多数席位,但在1981年大选中败给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此后至2011年都是两党交替执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执政年份包括1981—1989、1993—2004以及2009—2011年,新民主党执政的年份包括1990—1993和2004—2009年。尽管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被视为左派政党,新民主党传统上被视为右派政党,但由于选票和选举竞争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民主党也不得不给自己贴上了“人民的政党”(people's party)的标签,它甚至不得不用抬价方式(outbid)跟已经过度承诺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相竞争。这样,希腊就发展成了民粹主义民主的类型——“执政党与(至少是)主要反对党都是民粹主义政党”。最终,“从很多方面看,政治恩惠(political patronage)是希腊危机的主要原因”。希腊政治仿佛从整体上沦为了“公地悲剧”的一种典型。在2010年9月21日的国会演讲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主要领导人奥佐罗斯·潘卡洛斯(Theodoros Pangalos)说:“我们(希腊人)通过卑鄙的做法、贿赂以及滥用公共资金,一起把它吃空了。”所以,塔基斯·帕帕斯的结论是:“希腊的危机是民粹主义民主的特定制度的结果——这种民粹主义民主下,执政党及其主要竞争者都是民粹主义者。”^①

正是由于这种体制与机制,希腊的两大主要政党都丧失了应

^① Takis S. Pappas, “Why Greece Fail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2, April 2013, pp. 31–45.

对希腊经济与财政危机的能力。于是,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困境,希腊开始兴起了极左政党与极右政党。在2012年5月与6月的两次国会大选中,分别有7个政党获得国会议席。其中,希腊新民主党仍然获得了最多的议席,但并未超过半数,它在6月大选中获得300个议席中的129个;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仅获得33个议席。而激进左派政党左翼政党联盟(Syriza Unionist Social Front)获得了71个席位,希腊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获得12个席位,带有新纳粹主义色彩的极右政党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获得18个席位,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党(Independent Greeks)获得20个席位,以及中左政党民主左派(Democratic Left)获得17个席位。

经过改革,希腊目前采用的选举制度是:(1)采用准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一院制议会,议员数量为300人;(2)设定3%选票的政党当选门槛,意在防止过小政党的当选;(3)获得议席最多的政党将获得50个议席的奖励,意在鼓励最大政党并促成多数党政府。但是,从选举数据看,希腊的政党体制在2012年的大选中已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原先稳定的两党制已经解体,多党制已经形成——国会政党数量高达7个;另一方面,国会7个政党中兴起了激进左派左翼政党联盟和具有新纳粹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所以,从数量与意识形态分裂程度看,希腊政党体制已符合乔万尼·萨托利所指的“极化多党制”的主要特征,而极化多党制通常都会削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①表4正好展示了这种趋势。2007年之前大选中,两大主要政党——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均能获得超过9成议席,得票较多的党都能组建单一多数党政府。2007年大选,两党共获得300个议席中的254个,比例还能达到84.7%。但是,在2012年大选中,原先两大

^① [意] 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六章,第184—297页。

主要政党——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仅获得 162 个议席，比例为 54%。若计算两个最大政党——新民主党与左翼政党联盟——的议席，共为 200 个，比例仅为 66.7%。同样重要的是，激进左派左翼政党联盟获得了 23.7% 的议席，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获得了 6% 的议席。这种政党体制的变化甚至让人联想到德国魏玛共和国后期的政党政治。^① 2013 年 9 月 18 日一位反法西斯主义的歌手被金色黎明党党部一位工作人员刺死之后，希腊政府发起了针对金色黎明党的反纳粹主义行动，并逮捕了包括该党领导人在内的多名涉案的该党国会议员。这也说明希腊国内意识形态与政治冲突还在加剧。

表 4 希腊主要政党议席数量：1981—2012 年(单位：个)

政党	年份					
	1981	1990	2000	2007	2009	2012
新民主党	115	150	125	152	91	129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	172	123	158	102	160	33
希腊共产党	13		11	22	21	12
民主左派						17
左翼政党联盟		19	6	14	13	71
东正教阵线 (Popular Orthodox Rally)				10	15	
独立希腊人党						20
金色黎明党						18
其他(小党与独立候选人)		8				
合计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选举数据资料整理。

^① 参见阿里斯提德·海茨斯(Aristides Hatzis)在《金融时报》网站发表的文章：“Watch Greece - it may be the next Weimar Germany”, Nov. 6, 2013, <http://www.ft.com/intl/cms/s/0/dc877c6e-46df-11e3-9c1b-00144feabdc0.html>.

极化多党制的兴起也使得希腊一党多数派政府成为历史。早在2011年11月11日,希腊就成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新民主党、东正教阵线三党联合政府,但这一政府仅维持到2012年5月17日。在随后的两场大选之后,希腊又成立了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民主左派的三党联合政府。但是,2013年6月25日,希腊内阁又演变为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两党联合政府。政府或内阁的稳定性,往往是政体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但倘若希腊不能很好地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不能实现有效治理时,其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一样会受到削弱。

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另外一个重要政治事件是美国部分政府机构的临时关闭(shutdown)。2013年10月1—16日,由于国会山与白宫不能就提高美国政府公债上限达成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关闭了部分政府机构。尽管此事仅仅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这次事件的影响是严重的,由于存在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此事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国国家信用评级以及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导致美国部分政府机构关闭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公债规模的持续上升,以及共和党与民主党不能就继续提高政府债务上限达成共识。但是,这一政府关门危机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

这一制度原因与比较政治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大论战有关。美国是经典的总统制模式,总统制模式的可能问题是: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同时控制总统职位、参议院多数和众议院多数,政府将会成为一个行政权—立法权关系上的“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这样,如果国会与总统不能就重大的财政或立法问题达成一致,该国可能会陷入政治僵局(political deadlock),甚至引发宪法危机(constitutional crisis)。实际上,这就是导致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关闭的制度成因。尽管胡安·林茨关于“总统制的危害”论文及议会制优于总统制的观点在

学界既拥有支持者，又不乏反对者。^①但是，2013年10月美国政府的这场危机，或多或少佐证了林茨关于总统制的观点。当然，美国的这次政治危机最终得以平稳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政治阶层(political class)的训练有素，以及共和、民主两党在意识形态与基本政策上分歧还不算太大。但是，如果同样的制度结构与政治危机出现在一个新兴民主转型国家，则此种政治僵局就有可能引发总统启动紧急状态或军人干政。^②

无论是美国还是希腊，都说明一国财政或治理的危机可能影响民主政体本身的运转。从希腊的案例可以看到民粹主义民主所造成的危害，而美国的案例则揭示出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结构性对抗可能引发政治危机。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稳定性总的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即便对于这些国家，倘若民主不能实现有效治理，仍然可能削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

二、“阿拉伯之春”的困境

在2010年之前的第三波民主化文献中，中东北非(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地区被视为一个未受第三波民主化显著影响的特例。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从2010年12月18日开始，一场被西方学界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革命席卷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这场政治运动起源于突尼斯一名遭警察虐待小贩的自焚，该事件随后引发了民众对于政府的大规模抗议。很快，抗议波及中东北非的其他国家。截至2013年底，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与也

^① 总统制与议会制的论战参见 Juan J.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1(1990), pp. 51 - 69; Robert Elgie (2005), “From Linz to Tsebelis: Three Waves of Presidential/Parliamentary Studies?”, *Democratization*, Vol. 12, No. 1, pp. 106 - 122.

^② 美国之外的很多总统制国家因为立法权-行政权的政治僵局而导致民主崩溃，参见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门等国的统治者和政权被推翻,巴林与叙利亚等国爆发了暴动与武装冲突,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与摩洛哥等国发生了大规模抗议,阿曼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及巴勒斯坦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

这场政治变革被西方学界视为自苏东剧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地域性政治革命,也是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2011年1月6日,马克·林奇(Marc Lynch)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把这场运动称为“阿拉伯之春”。^① 为什么会出现“阿拉伯之春”? 学界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1) 中东北非地区威权政体合法性的下降,表现为该地区的政府滥用权力、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大规模失业引发的民众不满;(2) 由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引起的民众期望值的提高与滞后的政府改革之间的紧张关系;(3)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使抗议民众在组织动员上获得了快速、便捷的技术手段;(4) 欧洲、美国及主要国际组织持续地对该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并在政治冲突与转型的关键时刻直接干预了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5) 更多地接受欧洲模式的土耳其日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样板,激发了其他国家民众要求变革的更大渴望——这可以被视为滚雪球效应的一种情形。^② 除了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这一因素的影响之外,塞缪尔·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解释,也适用于“阿拉伯之春”。^③

尽管“阿拉伯之春”从2010年底启动之后迅速成为一场声势

① Marc Lynch, “Obama’s ‘Arab Spring’?”, *Foreign Policy*, January 6, 2011.

② Olivier Ro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2, No. 3, Jul. 2012, pp. 5-18; Alfred Stepan and Juan J. Linz,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the ‘Arab Spr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2, Apr. 2013, pp. 15-30.

③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晚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137页。

浩大的政治革命，但学术界并没有对它抱有十分乐观的期待。笔者基于经验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期间要经历 1.5 次—1.7 次的民主崩溃，民主转型是一个历时漫长、呈现周期性特征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① 对于中东北非地区来说，国际学术界认为其民主转型的困难来自多个方面。首先，中东北非国家经济水平（特别是不考虑石油资源）、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现有的理论都认为这些因素不利于民主转型和巩固。^② 其次，中东北非国家民主建设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该地区的政教关系。很多学者担心民主转型可能会演变为伊斯兰革命。在不少国家，一旦政治解禁，穆斯林兄弟会或穆斯林联盟可能会成为最有影响的政治组织。一旦这类政党掌权，就可能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如果是这样，就会与现代民主政体保护宗教与信仰自由的原则相抵触。此外，政教合一政策更容易引发宗教冲突。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或转型之后，国家能否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和世俗化，是一个关键问题。^③ 再次，中东北非地区能否在转型过程中构建正常的军政关系，也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这些国家过去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军政关系，文官政府控制军事力量的能力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武装冲突甚至是内战，那么这些国家能够实现去军事化吗？最后的挑战来自这些国家精英们的政治信念、政治行为与领导力。在中东北非地区，政治精英们通常缺少坚定的民主信念、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以及管理民主的政治过程所需的领导力。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使得这场始料未及的政治革命变得前途未卜。事实上，当“阿拉伯

^① 包刚升：“民主转型的周期性：从启动、崩溃到巩固”，载《二十一世纪》，2012 年四月号。

^② 相关理论综述参见包刚升：“第十四章 政治发展的社会维度”，载宋磊、朱天飏主编：《发展与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8—305 页。

^③ Hillel Fradkin, “Arab Democracy or Islamist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1, Jan. 2013, pp. 5–13.

之春”进展到第三年时,该地区的民主转型就显露出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2013年埃及政变的发生和利比亚暴力冲突的强化则预示着该地区民主转型的困境。

埃及自穆巴拉克倒台之后,于2011年3月29日通过了埃及宪法修正案,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总统制的宪法架构。埃及议会实行两院制,下院是人民议会(the People's Assembly of Egypt),上院是协商议会(Egyptian Shura Council)。人民议会中,498个议席由选举产生,其中三分之二议席(332个)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三分之一议席(166个)由多数制选举产生;10个议席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简称SCAF)任命。协商议会共270个议席,其中120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60个议席由多数制选举产生,90个议席由总统任命产生。在2011年11月28日至2012年2月22日举行的两院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伊斯兰主义集团(Islamist Bloc)、新华夫托党(New Wafd Party)、埃及人集团(Egyptian Bloc)等政党所获议席分列两院前四位,其中自由与正义党和伊斯兰主义集团获得两院选举议席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自由与正义党是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2012年5月23、24日及6月16、17日,埃及举行了民主革命之后的首次总统选举,选举采用两轮绝对多数制。穆斯林兄弟会即自由与正义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以首轮24.78%的得票率和第二轮51.7%的得票率战胜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当选2011年埃及革命之后的首任总统。

在议会与总统产生以后,新组建的制宪委员会于2012年11月29日制定了新宪法,并在12月15—22日完成了全国“宪法投票”。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新宪法既规定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与政治制度,又规定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同时,新宪法将伊斯兰教原则确定为立法的主要来源,这就为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冲突埋下了隐患。更重要的是,穆尔西总统执政后,仍然难以处

理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以及伊斯兰教与世俗自由派之间的关系，后者认为国家越来越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支配，整个国家正在全面的伊斯兰化；二是民选的文官政府、基于民众支持的政党力量与强大的军方之间的关系，穆尔西希望弱化军方势力但阻力重重；三是埃及社会亟待恢复秩序，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亟待正常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和解、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的增加。此外，穆尔西通常被其他政治派别认为政治上过于强硬，在执政过程中并不能吸纳和包容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见与诉求。

因此，2013年6月底到7月初，从埃及首都开罗到其他主要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一些城市发生暴力事件。随后，埃及军方向穆尔西发出最后通牒，并于7月3日深夜宣布罢黜和软禁穆尔西总统，搁置宪法，陆续逮捕穆斯林兄弟会主要成员以及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2013年12月，埃及政府总理甚至称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这样，穆尔西这位真正民选的埃及总统就被军方废黜了，宪法运转仅仅190多天就遭到搁置，埃及民主转型陷入了困境。尽管此后军方很快任命了临时总统，计划修订宪法，并考虑在2014年进行新的总统选举。但埃及的社会分裂与政治冲突并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反而随着军方对前任穆尔西的司法指控与诉讼案而日益加深。

内森·布朗(Nathan J. Brown)认为，2013年7月的政变意味着埃及转型已经失败。布朗认为，埃及民主转型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执政党与反对派的政治行为者都没有采取正确的行为。“穆斯林兄弟会并非是反民主的，但它所理解的民主概念是肤浅的和不自由的(illiberal)”，而且其统治方式是“高压式的”(high-handed)。反对派的行为也是非民主的，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家不仅号召推迟甚至抵制选举，而且试图通过街头政治以及呼吁军方干预来推翻民选总统。历史地看，埃及过去威权统治的历史是其民主转型的沉重负担。比如，威权的行为者——特别是军方——仍然在扮演

着重要角色；威权解体后有利于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结构以及非伊斯兰主义者对选举的不信任；威权主义时代的基础政治架构仍然在起作用；以及政治精英们缺少民主实践的经验。总之，“对民主来说，威权政治是一所糟糕的学校”。此外，布朗还认为，埃及转型缺乏有效的设计，从宪法架构到军政关系，都没有很好的设计。埃及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上述诸种问题使得埃及转型遭遇了失败——至少目前来看仍然如此。^①

在“阿拉伯之春”中，利比亚的政治转型充满了暴力与血腥，属于从威权政体到内战再启动民主转型的案例。受其他国家政治抗议运动的影响，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开始出现和平的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军武力镇压后演变为武装起义，随后利比亚内战爆发。内战双方分别为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政府与政府军，以及反对卡扎菲的势力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利比亚内战相持不下之时，先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了禁飞区，后来部分北约国家又直接参与了针对卡扎菲政府军的空袭与武装行动，这样力量的天平就倒向了反对派。2011年8月反对派占领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在逃避抓捕过程中被杀，10月23日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内战结束。据估算，利比亚内战大约造成25 000—30 000人死亡。

内战结束以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启动了向民主转型的工作。利比亚国民议会的首次选举在2012年7月7日举行。利比亚设立一院制的国民议会，共200个议席，其中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拥有100个议席，东北昔兰尼加地区拥有60个议席，南部费赞地区拥有40个议席。在所有议席中，80个议席根据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120个议席根据两种不同的选举制度

^① Nathan J. Brown, "Egypt's Failed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 2013, pp. 45-58.

在独立人士中选举产生。^① 此种选举制度的设计，目的在于防止穆斯林兄弟会创立的政党可能一举控制议会多数议席。选举结果是：在 80 个政党议席中，倾向自由和世俗的政党全国力量联盟 (National Forces Alliance) 获得 39 个议席，穆斯林兄弟会创立的公正与建设党 (Justice and Construction) 获得 17 个议席，另外 19 个政党分别获得 1 和 3 个议席，其余 120 个议席为独立人士赢得。随后，利比亚国民议会经过艰难的磋商，于 2012 年 10 月 14 日选举产生了利比亚民选政府的新一任总理。

然而，就在人们对利比亚民主转型的前景充满期待之时，各种严重的政治、军事与社会问题开始显露，这些问题意味着利比亚的政治转型道路不会平坦。2013 年的标志性政治事件是总理阿里·扎伊丹 (Ali Zeidan) 在 10 月 10 日遭到了绑架。^② 此事尽管最终化险为夷，但反映出利比亚脆弱的民主制度时时遭受着政治暴力的威胁。实际上，利比亚自国民议会选举以来，暴力事件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按照新华社的报道，2013 年 11—12 月两个月中利比亚至少就发生如下暴力冲突：^③

2013 年 12 月 22 日，利比亚班加西附近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 13 人死亡；

2013 年 12 月 16 日，利比亚电力公司员工被绑架，全国大部分地区电力中断；

2013 年 12 月 5 日，一名美国教师在班加西附近遭枪击身亡；

2013 年 12 月 1 日，利比亚武装分子攻击南部城市监狱，40 名囚犯逃脱；

2013 年 11 月 29 日，利比亚一军火库遭武装人员袭击和洗

^① 这 120 个议席中的 40 个根据简单多数决定制按照每个选区一个议席选举产生，80 个根据多数决定制按照每个选区多个议席选举产生，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单记名不可转让投票制。

^② 参见 BBC 新闻网：<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24470850>。

^③ 相关新闻参见新华通讯社主办的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劫,致数十人死亡;

2013年11月27日,利比亚东部5名士兵被暗杀;

2013年11月25日,利比亚特种部队与该国民兵组织安萨尔旅在班加西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至少9人死亡;

2013年11月15日,利比亚“反武装”示威遭到民兵组织的袭击,数百人伤亡,随后利比亚政府宣布的黎波里进入紧急状态;

2013年11月7日,利比亚首都爆发激烈冲突,致2死超20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3年12月16日通过主席声明,对利比亚安全局势和政治分裂不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有可能破坏利比亚民主进程。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利比亚各方开展和平对话,并呼吁政府加强军事和警察机构,努力恢复公共秩序及治安,并打击极端团体的暴力行动。另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尔的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Mahamadou Issoufou)则认为,如果利比亚落入极端宗教分子手中,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索马里。

米奇斯瓦夫·博杜泽斯基(Mieczystaw P. Boduszyski)和邓肯·皮卡德(Duncan Pickard)认为,利比亚过去国家建设与制度建设的不足“构成了民主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卡扎菲时代,利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非常脆弱。卡扎菲更多地借助军队和私人恩惠关系进行统治,主要“依靠暴力与恐惧”。所以,卡扎菲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制度遗产,因为他几乎不依靠制度进行统治,“他本身就是制度”。这样,制度本身的匮乏使得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建立新制度——特别是起草宪法和建立国家机构——的努力变得很艰难。^① 国家建设的不足,一方面使得利比亚不同地区的族群、宗教、部落集团尚不能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另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在内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地民兵组织与地

^① Mieczystaw P. Boduszyski and Duncan Pickard, "Libya Starts from Scratch",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 2013, pp. 86-96.

方武装力量。前者孕育着政治分裂与政治冲突，后者更容易使这种分裂与冲突暴力化。接下来，利比亚民主政府的最大挑战是：它同时面临着国家重建(state-rebuilding)与民主转型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利比亚中央政府需要控制暴力，统一军事力量和构造正常的军政关系；另一方面，利比亚中央政府还需要弥合不同维度的政治分裂，强化政治整合。从目前局势来看，利比亚可能会陷入组织化暴力竞争的转型困境。^①

此外，利比亚中央政府能否形成足够有效的政府效能与国家能力，还与该国政治精英阶层对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转型次序的管理有关。按照上文介绍，利比亚目前的选举制度设计固然能够防止穆斯林兄弟会获取绝对多数议席以及避免国家的伊斯兰化，但这种设计同时弱化了政党力量与政党体制。在全部的200个议席中，与政党有关的议席仅有80个。结果是，政党力量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政党体制高度碎片化，国民议会中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执政党或执政党联盟，而这对新兴转型国家非常关键。另一方面，选举规则还规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参加国民会议员的选举。此举目的是在制定选举规则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与随后选举的国民议会之间建立一种政治隔离机制，以便能形成更公平的政治规则，但却排斥了很多在全国过渡委员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优秀政治家，甚至会引发新旧政治力量的断裂。如何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以及如何有效管理转型过程，是利比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亚洲民主的新迹象

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2013年在国内政治上是较为平稳的一年。但是，对威权政治色彩浓厚的三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緬

^① 相关研究参见包刚升：“国家重建、组织化暴力与政治转型——1911—1937年中国民主转型为什么会失败？”，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3辑，第1—18页。

旬来说,2013年则意味着民主因素日益加强;对以民主不稳定著称的泰国来说,2013年的民主道路依然充满了坎坷。本节主要以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的政治状况来评述2013年亚洲民主的新趋势。

新加坡通常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威权主义国家,很多学者把该国视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重大例外。按照《新加坡宪法》,该国是实行一院制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但实际上,新加坡主要政党人民行动党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都能通过政治操作和选举控制占有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新加坡政府的历任总理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也一贯是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出任的。自1965年独立至2011年之前的国会大选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仅在1991年大选中丢失过4个议席,其他年份大选中丢失的议席均未超过2个,而且在多次大选中包揽全部议席。这种选举结果一方面反映了人民行动党在政治上的强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加坡选举制度的特点——该党实际上只获得61%—75%的得票率就能控制绝大多数议席。

2011年5月7日,新加坡进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共87个议席,由12个单选区(即一个选区只产生一个议席)和15个集选区(一个选区议席数不超过5个)组成。结果,人民行动党依然以议席数量的绝对优势赢得大选,但在87个议席中仅得到81个议席,6个议席为新加坡工人党获得。更重要的是,在得票率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比率降至60.14%,创下新加坡独立以来得票率的新低。这意味着以工人党为首的各反对党共获得39.86%的选票,几近四成。2013年的新加坡则延续了这种政治态势。由于议员出缺,2013年1月新加坡的鹅榜东区举行议员补选。来自反对党工人党的女性政治家李丽连以54.52%的得票率击败人民行动党的许宝琨,赢得鹅榜东区的议席,成为新加坡第一位赢得单选区的女性反对党议员。这样,在国会87席民选议席中,反对党工人党的数量上升至7席,这一数字还很小但具有突破性。

对新加坡来说,2016年的下一次国会大选可能会具有标志性意义。按照新加坡选举制度的设计,如果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降至50%左右或以下,则该党占据国会议席绝对优势的格局可能会出现雪崩。如果是这样,就不排除未来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可能性。^①当然,未来新加坡的政治往哪个方向发展,主要还取决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理念与选择。

马来西亚自1957年制定宪法以来就被视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独立之后,马来西亚尽管经历了一个多党竞争的时期,但从1969年主要政党“巫统”组建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开始,该组织就一直在历次大选中稳操胜券,执政至今。因此,马来西亚196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被视为一个具有浓厚威权色彩的、同时维持着周期性选举的国家。然而,2008年选举似乎开始打破马来西亚原有的政治格局。马来西亚国会是最髙立法机构,由下议院和上议院组成,其中下议院拥有更大政治权力,由222名议员组成,议员以小选区简单多数决定选举产生。2008年3月8日,马来西亚举行了第12届国会下议院的大选。在222个席位中,执政党国民阵线尽管获得了140个席位(比例为63.1%),但这是1969年大选以来国民阵线首次没有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反对党赢得了82个席位(比例为36.9%)。此外,在同时举行的12个州的地方选举中,反对党赢得5个州的选举。这样,经过2008年的选举,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不仅控制了国会下议院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还控制了13个州地方议会和政府中的5个。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实质性的政治竞争得到了显著加强。正是因为这场选举,国际评级机构 Polity IV 将马来西亚的民主评分从3分上调至6分(满分为10分)。^②

^① 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得票率为12.83%,民族团结党12.04%,其他选票为更小政党获得。

^② 参见 Polity IV 对马来西亚的评级,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mal2.htm>。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的选举就成了观察该国民主趋势的风向标。马来西亚的民主趋势会得到强化吗?在2013年5月5日第13届国会下议院选举中,执政政党联盟国民阵线获得222个议席中的133席,比例为59.9%,国民阵线首次失去6成多数席位;反对党联盟民主联盟获得89席,比例为40.1%,赢得4成席位。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得票率方面,国民阵线降至47.4%,首次跌破50%的多数优势线;民主联盟升至50.8%,实际得票率已经反超执政党国民阵线——国民阵线赢得较多议席靠的是有利的选举制度设计。如果这一趋势得到强化,马来西亚两大政党联盟为主的竞争性政党体制就有可能形成。当然,只有执政党不选择以非民主方式打压政治对手,并且在失去议会多数议席的条件下同意交出执政权力,马来西亚才能成为通过选举走向民主的转型案例。但是,2013年马来西亚的选举结果公布以后,反对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现在看来,执政党对选举与权力的操纵、相对滞后的政治文化以及较高分度的社会分裂,都是马来西亚下一步民主转型面临的挑战。^①

亚洲另一个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国家是缅甸。目前看来,缅甸正在经历一场由执政集团主动发起的民主转型。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竞争性政体,1962年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由此开始了军人统治。2007年8月中旬,缅甸主要城市仰光(原首都)爆发大规模的反军政府示威,约数十万人参加示威,其诉求从最初的抗议油价高涨发展为向军政府要求民主。至9月26日,军政府开始对示威进行镇压,造成数人死亡。但此后不久,缅甸军政府在2008年2月宣布将进行新宪法公投,并将于2010年进行民主选举。这样,缅甸就开始启动民主改革。

从2010年开始至今,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陆续

^① Bridget Welsh, "Malaysia's Elections: A Step Backwar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 2013, pp. 136-150.

释放了大量政治犯——包括被软禁 15 年之久的著名反对派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并与之对话，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颁布有利于工会的劳动法，放松新闻与出版审查，等等。通常来说，选举改革是民主改革的关键步骤。缅甸民主改革的重要事件是 2010 年的选举与 2012 年的补选。按照新宪法的规定，缅甸议会由人民院和民族院组成，其中人民院为 440 个议席，民族院为 224 个议席。2010 年 11 月 7 日，缅甸举行了自军政府以来首次大选。以较严格的标准看，这场大选是充满瑕疵的。首先是议席分配，人民院 440 个议席中有 110 个任命议席，民族院 224 个议席中有 56 个任命议席；其次是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对服过刑的政治犯设了禁入令；再次是来自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的选举观察员们认为，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与不公。尽管如此，这是缅甸军政府以来的第一次多党制选举，选举是公开的和竞争性的，30 多个政党参加竞争。

结果，在人民院 330 个选举议席中，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获得 259 个议席，掸族民族民主联盟获得 18 个议席，国民团结党获得 12 个议席，国民民主力量党获得 12 个议席，若开族民族发展党获得 9 个议席，其他政党获得 1—3 个议席不等；在民族院 168 个选举议席中，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获得 129 个议席，若开族民族发展党与国民团结党分获 7 个和 5 个议席，其他政党分别获得 1—4 个议席不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著名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未能参加 2010 年的全国大选。随后，由于部分国会议员当选政府内阁官员失去国会议员身份（宪法规定条款），2012 年 4 月 1 日缅甸又进行 46 名议员的补选。这样，已经获得参选资格的全民民主联盟及昂山素季首次参选并大获全胜，该党在所竞争的 44 个议席中赢得 43 席，昂山素季本人当选国会议员。这样，全国民主联盟就成了缅甸第二大政党与最大的反对党。

首次大选之后，2011 年 2 月 4 日，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主要领

领导人吴登盛被国会选为缅甸总统。不久之后,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将军宣布退位,并解散军政府的执政机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于新任总统吴登盛是丹瑞将军的亲信与指定的政治领导人,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丹瑞将军已经淡出缅甸政坛。2013年以来,缅甸政治的总趋势仍然是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继续推进民主改革。一方面,该党继续释放在押政治犯和推进国内政治公开。根据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消息,继2010—2012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之后,缅甸政府又在2013年5月19日释放20名政治犯,7月25日释放23名政治犯,10月9日释放56名政治犯,11月15日释放69名政治犯,12月11日释放44名政治犯,12月31日又释放200多名政治犯。此外,2013年3月底缅甸政府开始全面开放报禁,国际媒体和国内民营机构获准在缅甸出版与发行报纸。这项权利也被授予全国民主联盟这样的反对党。另一方面,缅甸试图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便在民主改革中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吴登盛先后在2012、2013年访问了美国和英国,同时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2013年先后访问缅甸,并承诺给予支持。这些国际因素都有利于缅甸下一步继续推进政治转型。因此,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专家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认为,完全有理由对缅甸的民主转型持有乐观态度。^①

尽管如此,缅甸的民主转型之路并不会平坦。影响未来缅甸民主进程的主要因素包括:(1)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态度与选择。在执政党内,以吴登盛总统为首的执政集团及已退居幕后但仍然发挥作用的以丹瑞将军为首的元老集团的态度与选择都很重要。最关键的是,如果2015年及其后续选举威胁到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是否还能继续推进民主改革?(2)与

^① 参见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30/myanmars_moment_development_asian_tiger#sthash.0XR49W5g.dpbs.

领导人丹瑞
与发展委
将军的亲
经淡出緬
联邦巩固
押政治犯
继 2010—
5月19日
日释放 56
又 44 名政
3月底緬
准在緬甸
洋的反对
切的合作
盛先后在
美国总统
緬甸，并承
进政治转
杂志上撰
来緬甸
党的态度
已退居幕
与选择都
联邦巩固
(2) 与

执政党密切相关的是，军人集团的政治态度也很重要。緬甸军方是该国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且在国会占有相当比例的议席。完全的民主转型意味着军方不仅要退出政治职位，而且要臣服于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緬甸军方会接受这种政治命运吗？据《联合早报》报道，2013年3月27日，緬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在建军节的讲话中称，军方目标是建设“训练有素的民主国家”，军方要为国家民主化保驾护航。这固然是一则好消息，但前景尚不明朗。

(3) 不同政党与主要政治精英的竞争和合作能否达成较好的平衡。目前看来，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和全国民主同盟的政治关系最为紧要，而摆在两党面前的一大问题是宪法条款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限制。按照现有条款，昂山素季将无法参选总统。因此，緬甸政坛目前关于修宪的政治争论非常激烈。未来緬甸能否形成稳定的竞争性政党体制需拭目以待。

(4) 緬甸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会对民主转型形成压制。緬甸社会存在比较复杂的族群、宗教与语言集团，2013年以来就发生百余起族群-宗教的暴力冲突事件；緬甸北部克钦邦还存在独立武装组织与政府军的持续冲突；緬甸属于全球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目前人均GDP不足1000美金；緬甸政军机构都比较腐败，在透明国际2013年对177个政治体的腐败指数评估中排名第157位。^① 上述条件都构成緬甸民主转型的重大阻力。^②

泰国是亚洲国家中民主不稳定的典型。最近10年中，泰国政治持续地在民选政府、街头政治与军事政变三者之间来回摇摆。2013年的泰国似乎也没有逃脱这一魔咒。2011年7月3日，泰国进行了第24届国会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选举。按照泰国的选举制度，众议院500个议席中，375个议席按照简单

① 参见透明国际对緬甸的评级，<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3/results/>。

② 参见 Min Zin and Brian Joseph, "The Democrats' Opportun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 4, Oct. 2012, pp. 104-119.

多数决定选举产生,125个议席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选举结果是,英拉·西那瓦(Yingluck Chinnawat)所领导的为泰党(Pheu Thai)获得过半数的265个议席,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阿披实·威差奇瓦(Aphisit Wetchachiwa)领导的民主党(Democrat)获得159个议席,成为众议院第二大党;其他9个小型政党分享76个议席。众所周知,为泰党是他信的支持者,沿袭的是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的政治传统,英拉本人又是他信的妹妹。8月5日,为泰党组成了新一届泰国政府,英拉出任总理。

从2006年总理他信被军事政变所驱逐,到2011年英拉当选新的泰国总理,只经历5年时间。这5年中,泰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分裂并没有变化。所以,英拉政府面临的仍然是类似的老问题。总的来看,泰国社会依贫富与地区界限分裂为两大主要阵营——红衫军与黄衫军。红衫军是泰爱泰党及其继承者为泰党的支持者,他们较多地分布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据优势。而黄衫军则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往往是都市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从主张与诉求看,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分歧深刻,难以弥合。结果是,某一派的政党当政,另一派的政治力量就鼓动街头政治,以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游行来冲击现有的政治秩序。

2011年8月英拉和为泰党执政后,泰国这一基本的政治格局没有改变。到2013年,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再次兴起,导火索则是英拉政府在国会提交的特赦法案。这一法案关系到前任总理他信,所以充满争议。泰国法院曾在2008年以滥用职权罪缺席判处他信两年监禁,但他信一直流亡海外。如果英拉政府的特赦法案获国会两院通过,成为立法,就将为 he 信合法回国创造条件。然而,2013年8月特赦法案提出以来,就引发了泰国反对派的抗议。至11月,抗议规模越来越大,冲突愈演愈烈。在泰国首都曼谷,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规模从数万人到数十万人不等,示威游行的队伍一度占领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并要求英拉政府立即下台。

迫于政治压力，11月7日总理英拉撤回了特赦法案，但她同时宣布既不会辞职，也不会对示威者进行武力镇压。但由于反政府示威愈演愈烈，英拉在12月9日不得不解散议会众议院，并宣布2014年2月2日重新进行议会选举。英拉解散国会众议院的举措暂时缓解了政府反对派的抗议活动，但泰国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就此解决。一般认为，尽管国会众议院已经解散，但在2014年的选举中，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控制众议院多数议席的可能性较大，英拉与为泰党可能继续组阁执政。如果是这样，那么为泰党的反对者——黄衫军很有可能再次通过抗议和示威制造政治乱局，他们甚至希望通过制造混乱迫使军方干预政治，改变民主党在选举中处于少数地位的现状。因此，2013年的泰国并没有走出民主不稳定的怪圈。^①

四、世界其他地区的转型与变革

在原苏东地区，俄罗斯是最重要的国家，因此其政治转型进程备受关注。按照宪法，俄罗斯是一个半总统制国家。俄罗斯联邦议会由上院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和下院国家杜马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内84个主体各派出2名代表组成，共168个席位；下院国家杜马是更主要的立法机构，设450个议席，以全国范围内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政党当选门槛为7%的得票率。根据2011年12月4日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总统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以49.54%的实际得票率获得238个议席，俄罗斯共产党以19.16%的实际得票率获得92个议席，公正俄罗斯党以13.22%的实际得票率获得64个议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11.66%的实际得票率获得56个议席。这样，统一俄罗斯

^① 参见 Thitinan Pongsudhirak, "Thailand's Uneasy Passa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 2, Apr. 2012, pp. 47-61.

党就控制了超过 50% 的议席。从俄罗斯联邦议会的选举制度看，均较为有利于现有执政党。

按照宪法，俄罗斯总统由国民直选产生，以两轮绝对多数制（如果第一轮没有候选人得到超过 50% 的选票）选举产生。2012 年 3 月 4 日，俄罗斯进行了启动转型以来的第五次总统选举。曾经担任过两届总统、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再次参选，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则放弃参选。选举结果是普京以 63.64% 的得票率当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久加诺夫以 17.18% 的得票率屈居第二。这样，普京不仅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而且根据宪法修正案，普京的任期将是 6 年，并且还可以再次连选连任一次。

然而，很多普通公民、媒体记者、政治活动家及外国观察员都认为，2011 年国家杜马选举及 2012 年总统选举均存在瑕疵和舞弊现象。正是以 2011 年 12 月国家杜马选举为导火索，对普京长期统治表示不满的俄罗斯人走上街头，爆发了大规模的“俄罗斯 2011—2012 年抗议示威”。2011 年 12 月 8 日，莫斯科有 8 000 人左右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结果，到 10 日，全国有 50 多个城市同时发生抗议活动，其中莫斯科有 5 万人参与抗议示威。示威人群公开表达对普京的不满，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选举结果，以及要求公平而自由的选举，等等。2012 年 5 月 6—7 日，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前夕，莫斯科又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有数百人遭到逮捕。这种大规模抗议的背后是很多俄罗斯人对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统治表示不满。在 2013 年 4 月的一项调查中，51% 的俄罗斯人认为“统一俄罗斯党是一个‘无赖和窃贼之党’(party of crooks and thieves)”^①。

今天的俄罗斯通常被视为“半威权主义政体”(semi-authoritarianism)。“虽然普通俄罗斯人享有较大程度的个人自

^① 转引自 Miriam Lansky and Elspeth Suthers, “Outlawing the Oppo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3, Jul. 2013, pp. 75—87.

由，但政治却几乎是由一小撮人垄断的。”2011—2012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却表明，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不再满足这样的政治，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更大的政治透明度和更有效的政府问责。一些人期待俄罗斯的社会运动是否可能推动俄罗斯从半威权主义政体平稳过渡到完善的民主政体？但普京政府面对强大的抗议示威，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从2012年5月就任总统之后不久，普京就督促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来限制集会与言论自由，压制抗议示威及社会运动。比如，一项法律规定给参加未经批准集会的个人和组织分别处9 000美元和30 000美元的罚款；一项法律允许政府建立网站黑名单制度；一项法律则强化了对诽谤罪的指控；还有一项法律限制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与活动。按照密里安·兰斯科伊(Miriam Lanskoj)和埃尔斯佩·苏瑟斯(Elspeth Suthers)的看法，普京政府试图“用立法来使反对派非法化”(Outlawing the Opposition)。但无论怎样，俄罗斯人“如今对政治透明和问责制的诉求正日益高涨，也更不愿意继续接受现状”。^①

苏联的另一个加盟国家格鲁吉亚在过去一两年中也出现了显著的政治变化。这种政治变化的前奏是2010年通过的格鲁吉亚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的关键是削弱下一任总统的权力，而把更大的政治权力赋予总理和内阁。这样，从2013年新总统上任开始，格鲁吉亚从宪法模式上将会更接近于议会制政府模式。这一宪法修正案使得2012年10月1日举行的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变得更加重要。格鲁吉亚议会共150个议席，其中73席由简单多数决定选举产生，77席由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属于典型的混合型选举制度。结果，由格鲁吉亚首富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组建的新政党联盟“格鲁吉亚梦想党”

^① Miriam Lanskoj and Elspeth Suthers, “Outlawing the Oppo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3, Jul. 2013, pp. 75-87.

(Georgian Dream)赢得超过半数的 85 个议席,执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United National Movement)仅获得 65 个议席。这意味现有执政党将失去议会的多数席位,沦为反对党,而格鲁吉亚梦想党将成为执政党。10 月 25 日,伊万尼什维利顺利当选新总理,初步实现了格鲁吉亚的政党轮替。2013 年 10 月 27 日,格鲁吉亚又进行了新一轮总统选举。格鲁吉亚梦想党总统候选人、政治学家奥尔基·马尔格韦拉什维利(Giorgi Margvelashvili)以 62.12% 的得票率在首轮选举中战胜统一民族运动党总统候选人大卫·巴克拉泽(Davit Bakradze)——后者仅获得 21.72% 的选票,当选为新一届格鲁吉亚总统。这意味着作风强硬的原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将近 10 年统治彻底终结了。^①

如何评价格鲁吉亚这种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在 2012 年议会选举之前,格鲁吉亚通常被视为一个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国家。自 2003 年 11 月玫瑰花革命之后,萨卡什维利赢得了 2004 年总统选举并开始领导格鲁吉亚。他把自己和自己的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视为格鲁吉亚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他一方面致力于清除警察与行政部门的腐败、打击犯罪,另一方面维持着高压式的统治,通过操纵选举、分化对手、限制媒体自由度、对非统治阵营企业家的财产处置等手段牢牢控制社会。考虑到与之竞争的政党力量分散,萨卡什维利在 2012 年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执政党会在选举中落败。他甚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以便自己卸任总统以后能够担任更具实权的总理职位——这被认为是在模仿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做法。但是,当亿万富翁伊万尼什维利决定参选并组建格鲁吉亚梦想党之后,这一切就迅速改变了。尽管格鲁吉亚梦想党遭到了来自执政党、政府与警察力量的严厉打压,包括总部电脑入侵、人身威胁、司法指控等,但格鲁吉亚选民最终选择

^① 参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588949-georgia-elects-new-less-powerful-president-end-saakashvilis-reign>.

了抛弃萨卡什维利及其领导的统一民族运动党，而把格鲁吉亚梦想党视为执政党的替代物。由此，查尔斯·费尔班克斯爵士(Charles H. Fairbanks Jr.)和阿列克斯·古古谢夫里(Alexi Gugushvili)认为，格鲁吉亚迎来了启动转型以来的第四次民主机会。但是，格鲁吉亚能否借此机会完成民主转型和实现民主巩固？目前看来，挑战仍然很大。^①

对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墨西哥来说，2012年的重要事件是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在12年后卷土重来，成为执政党。^②这使得20世纪末启动民主转型的国家墨西哥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众所周知，革命制度党曾经在墨西哥执政长达71年(1929—200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该党逐步推动墨西哥的政治改革，核心内容是选举法的改革和落实允许多党竞争的选举规则。这些改革的最终结果是，革命制度党在1997年的国会选举中只赢得不到一半的议员席位，并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国家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y)。此后，国家行动党又赢得2006年总统选举。这样，该党就连续执政了12年。

2012年又是墨西哥的总统大选之年。墨西哥总统选举实行一轮简单多数制。7月1日的选举结果是：革命制度党的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以38.21%的得票率当选新一届墨西哥总统，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的总统候选人分别屈居第二、三位。这样，革命制度党实现了东山再起，再次成为执政党。实际上，在2012年的墨西哥国会两院中，革命制度党拥有众议院500个议席中的212个，拥有参议院128个议席中的57个，在国会两院都是第一大党。革命制度党重新执政和实现政党轮替，显示了墨西哥新兴民主政体的稳定性。这样，墨西哥革命制

^① Charles H. Fairbanks Jr. and Alexi Gugushvili, "A New Chance for Georgian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1, Jan. 2013, pp. 116-127.

^② Gustavo Flores-Macias, "Mexico's 2012 Elections: The Return of the PRI",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1, Jan. 2013, pp. 128-141.

度党创造了第三波民主化中执政党主动启动民主转型并再次执政的典范。培尼亚·涅托总统上任以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总统办公室称:“自从2012年12月1日以来,联邦政府选择了一条改革之路,这是一条高要求、艰巨的路,需要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这也是唯一一条能够让墨西哥变成理想模样的道路。”总的来说,墨西哥的民主道路看来已经走上正轨。

对智利来说,2013年是一个大选年。在11月和12月举行的两轮绝对多数制总统选举中,代表新多数派(New Majority)参选的智利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 of Chile)总统候选人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以首轮46.70%、第二轮62.16%的得票率战胜代表联盟(智利)派(Alliance)参选的独立民主联盟(The Independent Democratic Union)候选人伊芙琳·马赛(Evelyn Matthei)。这样,米歇尔·巴切莱特在2014年出任新一届智利总统,成为智利转型以来的第六位民选总统。在同时进行的智利参议院大约半数席位及众议院全部议席的选举中,新多数派最终占据参议院38个席位中的21个,联盟(智利)派获得16个,独立候选人获得1个;新多数派占据众议院120个席位中的67个,联盟(智利)派获得49个,其他政党及独立候选人获得4个。这样,新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所在的新多数派同时赢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避免了出现一个立法-行政权关系上的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从最近几届大选看,智利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两大政党联盟的政党体制,新多数派与联盟(智利)派成为智利政坛的两大主导政党联盟,也是重要的政治稳定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智利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设计了双名选区制的独特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在一个选区设立两个席位,每一政党或政党联盟最多可以提出两名候选人,如第一高票候选人获得两倍于第二高票候选人,则该党囊括该选区的两个席位;否则,按得票率高低前两位候选人当选。与智利1973年之前的纯粹比例代表制相比,这种选举

制度塑造了组建大型政党联盟的强大动力，属于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的制度设计典范。

对另一备受瞩目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来说，2013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著名领导人乌戈·查韦斯的病逝。委内瑞拉的民主经历跟其他主要拉美国家差异很大。当拉美多数主要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饱受军事政变、军人统治与政治不稳定之苦时，委内瑞拉拥有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其公民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同时充分的政治竞争得以保证。但是，在智利、巴西、墨西哥等国20世纪80年代纷纷转向民主政体时，委内瑞拉的民主却出现了急剧地衰退。在国际著名政体评级机构Polity IV的民主评分中，委内瑞拉1990年为9分——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程度，但该国2010年的民主评分却降至1分。在自由之家2013年国家自由度等级评分中，委内瑞拉以政治权利5分和社会权利5分被评为部分自由（partly free）国家，而这两项分值与不自由（not free）国家已经非常接近。^①

委内瑞拉民主的衰退与查韦斯在政治上的崛起有关。他原先是一名军官，1992年试图政变，但没有成功。被总统特赦后，查韦斯开始组建政党并迅速崛起。依靠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层的支持，他在1998年12月6日的总统选举中以56%的得票率首次当选总统，并从1999年2月2日开始执政直到2013年3月5日病逝，统治委内瑞拉长达14年时间。查韦斯上任后开始推行“玻利瓦尔革命”，在国内政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抵制全球化，强调再分配政策和补贴低收入群体，修改宪法以强化总统权力，压制反对派，控制新闻媒体等；在对外政策上则大大淡化了传统上跟美国的密切关系，反而与古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的“反美中心”之一。2012年10月7日，查韦斯代表左翼政党联

^① 参见自由之家对委内瑞拉的评级，<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3/venezuela>。

盟——大爱国阵线(Great Patriotic Pole)以 54.42% 的得票率击败右翼政党联盟——民主统一圆桌联盟(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候选人恩里克·卡普利莱斯·拉东斯基(Henrique Capriles Radonski),第四次当选总统。

然而,此后不久,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因癌症去世。这样,委内瑞拉2013年4月14日又举行了新一届的总统大选。查韦斯的“亲密战友”、大爱国阵线总统候选人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以 7587 579 张选票、50.61% 的得票率的微弱优势,战胜反对党民主统一圆桌联盟总统候选人拉东斯基,后者获得 7 363 980 张选票和 49.12% 的得票率。作为查韦斯的政治继承人,马杜罗宣称会继续推行玻利瓦尔主义和查韦斯的政治路线。那么,查韦斯的离开对委内瑞拉意味着什么?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是,通常来说,威权色彩浓厚的政体其稳定性往往会受到政治领导人更迭的影响。无论怎样,一位备受争议同时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政治领袖的离场,或许会增加委内瑞拉重新走上民主之路的可能性。^①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还是比较脆弱的,委内瑞拉的政治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很多拉美国家尚在左翼与右翼之间、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摇摆。^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年肯尼亚大选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是2007年该国大选曾经引发严重骚乱,导致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所以,2013年大选也引起很多担忧。3月4日,根据2010年新宪法,肯尼亚总统、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同时举行。在总统选举中,肯尼亚民族联盟(The National Alliance)推出的朱比利联盟(Jubilee Alliance)总统候选人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

① 查韦斯之后的委内瑞拉政治,参见 Miriam Kornblith, “Chavismo After Chávez”,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3, Jul. 2013, pp. 47-61.

② 拉美民主的概况参见 Peter H. Smith,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erardo L. Munck, *Regim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ories and Meth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获得 50.51% 的有效票，战胜橙色民主运动 (Orange Democratic Movement) 推出的改革与民主联盟 (Coalition for Reforms and Democracy) 总统候选人拉伊拉·奥廷加 (Raila Odinga) 43.70% 的有效票，赢得总统职位。根据新宪法，该国参议院共设 67 个议席，其中 47 个议席代表 47 个县，16 个妇女代表由政党提名，青年人和残疾人各有 2 名代表。结果，以肯尼亚民族联盟为首的朱比利联盟获得 30 个议席，以橙色民主运动为首的改革与民主联盟获得 28 个议席，另 9 个议席为其他政党获得。该国众议院共设 349 个议席，其中 290 个议席由 47 个县按选区直接选举产生，47 个妇女代表由各县选举产生，10 个代表根据席位比例由各政党提名。结果，以肯尼亚民族联盟为首的朱比利联盟获得 167 个议席，以橙色民主运动为首的改革与民主联盟获得 141 个议席，另 41 个议席为其他政党获得。这样，朱比利联盟就成为国会参众两院的第一大政党联盟。

肯尼亚 2013 年选举的结果尽管受到反对党的质疑，但反对党领袖、败选的总统候选人认为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指出，肯尼亚大选结果公布后局势比较平稳的重要原因是，2010 年的新宪法大大削减了总统的权力，改变了旧宪法框架下总统权力过分集中和赢家通吃的局面。尽管如此，考虑到肯尼亚复杂的部族关系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该国的民主进程仍然充满变数。^①

西非内陆国家马里从独立到 1991 年都是由一系列独裁者统治的。1992 年，马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竞争性选举。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和阿马杜·图马尼·杜尔先后出任总统都达十年之久。但是，从 2012 年开始，马里局势的动荡开始加剧，首先

^① 参见 James D. Long, Karuti Kanyinga, Karen E. Ferree, and Clark Gibson, "Choosing Peace ove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3, Jul. 2013, pp. 140-155.

是1月北部出现新的武装叛乱；其次是3月21日，一批士兵在首都发动政变，推翻了杜尔政府。但随后，非洲地区组织——西非共同体对马里政变军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同意交出政权。这样，2013年马里就迎来新一轮大选。那么，马里能顺利地恢复民主体制吗？7月28日，马里举行了政变后的首次总统选举，选举方式是两轮绝对多数制。马里联盟(Rally for Mali)总统候选人易卜拉欣·凯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以首轮39.23%、第二轮77.61%的得票率成功击败共和民主联盟(Union for the Republic and Democracy)总统候选人索马伊拉·西塞(Soumaila Cisse)，高票当选马里新总统。2013年11—12月，马里又举行了一院制立法机构国民议会的选举。在国民议会共160个席位中，总统所在的马里联盟获得61个，共和民主联盟获得18个，马里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Democracy in Mali)获得20个，另外7个政党、独立候选人及海外代表获得其余席位。这样，通过行政首长和立法机构的选举，马里回归了民主政体，宪法程序得到了恢复。当然，马里的经济极其落后，民主基础仍然薄弱，北部地区还存在武装冲突。马里能否通过2013年的选举逐渐实现民主转型与巩固？现在尚难预料。

在谈到非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时，理查德·约瑟夫认为，1989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7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经历了政治改革，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看起来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少数国家将会继续自由化和民主化；一些国家将会回到压制性的独裁统治。”^①尽管这段话写在16年前，但仍然适用于今天的非洲。对很多非洲国家来说，能否通过选举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民主转

^① Richard Joseph,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fter 1989: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3,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Dankwart A. Rustow* (Apr., 1997), pp. 363-382.

型和巩固，目前看来依然是未定之数。^① 2013年12月15日，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南苏丹又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事情的导火索是出身于最大族群的总统解除出身于第二大族群的副总统的职务。截至12月底，南苏丹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上千人死亡和超过10万人逃离家园。目前，国际学界最悲观的估计是，不能排除南苏丹爆发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可能性。南苏丹的政治冲突又给非洲国家的民主与民主转型制造了新的阴影。

总之，2013年对全球民主与民主转型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尚需从根本上解决财政与公债问题，以改善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对中东非、原苏联地区、东南亚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国家来说，这项任务还尤为艰巨。放眼今天的世界，比较政治学过去用于解释民主转型的很多重要变量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些变量包括：一国的经济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类型、族群宗教分裂的程度、政治精英与政党的信念与选择、大国与主要国际组织的影响、宪法与政治制度设计的类型，等等。但与此同时，新的技术条件——特别是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正在快速地改变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的方式，这又进一步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个人与组织、反对派与执政党之间的力量平衡。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与民主转型在未来能否有所推进，一方面仍然取决于全球政治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本国政治行为者的民主信念、战略选择与政治博弈——最终，历史是人创造的。

^① Matthijs Bogaards, "Reexamining African Elec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 2013, pp. 151-160.

www.tudapress.com.cn

定价：23.00元

9 787309 106350 >



ISBN 978-7-309-10635-0